

諾貝爾文學獎秘史

4

王鴻仁譯

一九〇五年

(波蘭)亨利克·顯克維支

(Henryk Sienkiewicz)

從一九〇一年起，每屆的諾貝爾文學獎都遭到非議。雖然瑞典學院在進行遴選時態度極為認真，可是反對者總是會找得出一兩個理由來。一九〇五年獲獎的亨利克·顯克維支自然也遭到了攻擊。

由於大家都相信，顯氏的獲獎完全是靠着他的小說「暴君焚城錄」(Quo Vadis?)，所以泰半的責難文字也就一致指向這部小說。「暴君焚城錄」的銷路相當驚人，可是它的評價却不怎麼高。因此，不少

批評家認為這本書降低了諾貝爾文學獎的水準。甚至連許多普通的讀者也都以為這部小說只是一本極為通俗的暢銷書，距離偉大的文學作品還有一大截。受人輕視一向是暢銷書的命運：因為暢銷書在格調上總是偏低，在意識上總是流於陳腐。「暴君焚城錄」給人的印象當然也是如此。

可是，事實上，瑞典學院在進行遴選工作的時候並未特別強調這部小說的某項優點或某項特色。學院

是從整體上來評估這部小說的。欲明瞭這個「整體」的涵義則須翻閱波蘭多災多難的歷史。現在，讓我們先回顧顯氏參加競選的經過。

從一九〇一年起顯克維支每年都為他在瑞典的崇拜者所推薦。到了一九〇五年顯氏得獎的時機已經成熟了。那年參加角逐的候選人共有十五位，其中包括托爾斯泰、卡度齊、茜爾瑪、拉格洛夫、史溫朋，以及吉卜齡。瑞典學院在進行遴選的時候，外界的議論十分紛歧。在這種競爭激烈的狀況下，顯氏之所以能夠脫穎而出完全歸功於簡森（Alfred Jensen）。簡森是一位斯拉夫文學的專家，在斯堪地那維亞介紹並翻譯過顯氏的作品；所以當瑞典學院在考慮顯氏的時候就向簡森諮詢。簡森提出了一份對顯氏極為有利的報告；這份報告在學院中發揮了相當大的影響力。可是，事情還沒有這麼早就確定；各界的意見繼續分歧了一段很長的時間。甚至有許多小團體極力主張仿效一九〇四年的方式，將獎金對分，頒給顯氏和另一位波蘭的女作家奧爾芮斯柯（Elise Orzeszko）。爭論儘管激烈，不過今年斯拉夫人要得獎是已成定局

了。最後，這項殊榮終於由顯氏獨得。

前面已經說過，顯克維支的獲獎是有其獨特的歷史背景的。可是，為什麼一九〇五年是最恰當的時機呢？

波蘭是日耳曼世界與斯拉夫世界的甬道。由於這個地理上的原因，波蘭數度遭到了瓜分的厄運。顯克維支就是一位居住在俄國佔領部份的波蘭作家。而一九〇五年正是這部份波蘭最黑暗的一年。俄國的暴虐使全世界對波蘭充滿了同情。所以這年的諾貝爾文學獎也就罩上了這種色彩。就瑞典學院來說，把這項鉅獎頒給一位馳名遐邇的波蘭人不啻是向那「老在歐洲唱反調的稻草人」——帝俄——交遞了一個審慎的抗議。這項來自斯德哥爾摩的決定改變了世人對顯氏的看法。「暴君焚城錄」已不再是一部純粹消遣用的小說了。它暗藏着從未被發掘到的政治意識。該書對尼祿（Nero）的邪惡帝國之描繪在今日看來十分明顯地影射着俄國鐵蹄下的波蘭。而瑞典學院的決定更刺激了政治性的評論。巴黎有一家報紙（Le Siècle，世紀報）以這樣的言辭評論這件事情：

「暴君焚城錄被視為波蘭文學中不容置疑的傑作，因為它以隱喻的方式完成了一個具體的象徵，一個激勵著所有波蘭偉大作家及高超詩人的象徵。從這個觀點言之，這本書承襲了密基維茲（Mickiewicz），史洛瓦基（Slowacki）以及查列斯基（Bogdan Zaleski）的愛國詩之傳統。此項傳統從未中斷過。在這本敘述一個業已衰微但仍由一種精神力量所支撐的民族的小說裏，人們可以看到波蘭在對抗無盡期暴政時所做的奮鬥，更可看到他們對復國的殷望。」

選一九〇五年來表揚這位沙皇暴政壓迫下的波蘭文學鬥士真是選錯了時間。那年，俄國佔領部份的波蘭正陷於極為動盪不安的情況中。整個地區進行着全面的罷工。郵政業務已經完全停頓，對華沙的正常交通已告中斷。當局正式宣佈該地區業已進入封鎖狀態。在這種狀況下，瑞典學院根本無法用尋常的方式和顯氏聯繫，所以學院只好派出一名密使簡森，取道維也納前往克拉科（Cracow）。簡氏的任務是要透過奧屬波蘭和得獎人接頭，把這項好消息傳遞給他。簡氏好不容易才發了一通電報進俄國佔領下的波蘭，請

顯克維支到克拉科商討「重要事宜」。數日後，當鐵路恢復交通時，顯氏來到了克拉科。這樣，簡森才算交了差。

十一月二十九日顯克維支寄給學院一封信：

「如果這封信來得有點太遲的話，務請你們原諒。當我和簡森先生會過面之後，我又立刻被召回了華沙。我在華沙耽擱了幾天；我不想從那兒寫信給諸君，因為我們的信件（尤其是寄往國外的）都要被當局檢查，所以這項秘密就無法保守到預定的日子了。」

「我現在已經回到了克拉科。我一抵達就急忙寫信給諸君，並藉此誠懇地感謝你們那封謬讚又善意的信。」

「你們送來的消息使我感到由衷的快樂，而更快樂的是你們所頒的這項殊榮並非僅頒給我一個人而已。我將代表我們的國家以及我們的文學接受它。」

「我們的文學是如此的古老、如此的豐沃、如此的多彩多姿，可是它却又如此的為世人所忽視，以致於一些真正屬於它的成員都被誤認為（不管是有意的或是無心的）是俄國人。可是，我必須承認，現在情況確實已經改變了：這項由瑞典學院所頒贈的國際性

大獎嚴肅地肯定了我們在世界知識及文化進展中所佔的地位。

我將盡我最大的努力於指定的時間前往斯德哥爾摩，我並且非常樂意向貴學院以及貴國表達我的謝忱。

一九〇六年

(義大利) 吉奧綏·卡度齊

(Giosué Carducci)

吉奧綏·卡度齊的詩相當艱深，不像「每日祈禱書」一樣，每個人都可以朗朗上口，不過遠在一九〇六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以前，卡度齊就已經是一個家喻戶曉的人物了。他的聲望高得匪夷所思。他的人格被景仰、被崇拜、甚至被渲染得近乎神話一般。這種奇特的現象在文學史上是十分常見的，只不過各有各的因素罷了。就卡度齊言之，這個情形是由一本他的傳記造成的。那本書的結構相當散漫，裏面堆滿了卡氏個人的軼事，又紛亂地穿插了一些卡氏的名言

頒獎的那天他果然出席了。那是一個白皙瘦小的人，滿頭白髮，蓄着一撮尖尖的白鬍子，頗像老年時代的拿破崙三世。

該書強調着當時一般人最容易接受的東西：卡氏是一個愛國的詩人，並且大胆地攻擊反啓蒙主義（Obscurantism）以及教皇的權威。可是最重要的是：他曾詠出了「撒旦頌」（Hymn to Satan），曾發出了這樣的禮讚：「偉哉！噢，撒旦！噢，反叛！噢，理性的報復力量！願衆人向你獻香，願衆人在你面前起誓！汝已擊敗教士之耶和華！」

卡氏這個偏激的「召魔咒」給了一般民衆一個錯覺：他是一位羣衆的鬥士，又是一個勇往直前的宣傳

家。這個錯覺對於卡度齊的盛名不墜固然有着相當密切的關係，可是實際上卡氏的詩是非常學術性的。多年來他一直以他的詩闡釋着義大利文學史上那些崇高無倫的宗師們。他的詩都是精心雕琢下的產物，裏面蘊涵着豐富的古典引證。本質上它們是植根於一種帶着書卷氣的人文主義。這些詩在卡氏信徒們的心中都激發了熱情和求知的渴望。

由於卡度齊在義大利知識界的崇高地位，所以當諾貝爾獎剛創立的時候，他的名字就立刻被提了出來。不過他的競選却遭遇了重重的困難。爲了簡化起見，我們可以將這些困難歸納成兩大類。而兩者都是本世紀初所特有的。

從一九〇一年起諾貝爾文學獎便招引了一大羣極著名的歐洲作家。可是很不幸，這些作家泰半都已經年屆古稀。所以瑞典學院的諾貝爾委員會打一開始便喇喇不休地爭論着一個問題：將這項鉅獎頒給一位（極可能）已經無法再創造出偉大作品的老人是否恰當呢？這些「白髮蒼蒼的退休者」會是捐款者（慷慨的亞勒弗烈·諾貝爾）心目中的得獎人嗎？

當然，卡度齊在義大利文壇的崇高地位是不容置疑的。可是他現在已經是一個道道地地的老年人了（按：卡氏出生於一八三五年）。而年齡問題正是瑞典學院爭辯的焦點之一：學院應該用這項獎金來表揚一位工作已經完成的老人，或者應該用它來獎掖一個遠景燦爛的後起之秀呢？從一九〇一年到一九〇五年這位波洛格納（Bologna）的聖人——卡度齊——一直在等待着。對於一個日薄西山的人來說，這五年是愈來愈漫長的。而更不幸的是卡氏已經中了風，全身癱瘓了。這種情況使得卡氏的支持者們憂心如焚。當一位林却伊皇家學院（Real Accademia dei Lincei）的院士波爾桑尼伯爵（Count Ugo Bolzani），推薦卡氏問鼎一九〇六年的諾貝爾文學獎的時候，就呼籲瑞典學院不可延宕。波爾桑尼在那份充滿憂慮的推薦信上說：「如果諸君有意使此項無上的殊榮成爲他畢生成就的冠冕，則此事不宜延誤太久。因爲這位傑出作家的年歲以及（更重要的）健康情況已不容許他久等了。」

不過卡度齊終於以長壽解決了第一個問題——年齡問題。接下來他還得解決第二個——更棘手更微妙

的觀念問題。

「撒旦頌」是卡氏最具代表性的作品，然而這篇詩作所代表的時代早已成為過去了。今天的歐洲已經沒有人關心「理性的報復力量」，已經沒有人談論異端主義、反教士主義、理性主義以及加里波底時代的共和主義了。這些如今都已經被新神秘主義、新天主教主義、新浪漫主義，以及許許多多更加玄奧的「主義」所取代了。歐洲業已進入一個新的時代。昔日那些為卡氏所攻擊的障礙在今天都已變成無意義的東西了。卡度齊無法接受這個新的時代。他甚至認為歐洲正在開倒車。

卡氏和托爾斯泰有幾分相似，他們都是革命性的人物，殊難符合亞勒弗烈·諾貝爾在遺囑中所定下的標準。諾貝爾獎必須頒給俱有理想主義傾向的人，而瑞典學院對「理想主義」一辭的定義又是極其嚴苛的。所以要想讓卡度齊這位老鬥士得獎的話就得設法使瑞典學院能够接受他。對於卡氏的支持者們來說，這樁任務並不輕鬆。不過他們還是辦到了。他們對瑞典學院強調：卡度齊個人的觀念不容輕易地予以抹殺，

因為這樣做就等於全盤否認了卡氏作品中所特有的精銳之氣與強烈的說服力。更重要的是，瑞典學院應該從歷史與人情的角度來審查卡氏的候選權。而這點對卡氏是十分有利的。卡氏的作品充滿了高貴的情操、無我的胸懷以及對於人生的沉悶及挫折所表露的高超眼光：他是一位「兼具了慷慨的心與耀眼的智慧」的嘉圖（註）。

卡氏的支持者當中最著名的一位就是安東尼奧·佛加查洛（他自己也曾被提名諾貝爾獎）。佛加查洛比卡氏年輕，是卡氏在波洛格納大學的同僚。一九〇二年佛氏在該大學校長潘道尼（Vittorio Puntoni）的鼎力支持下，向瑞典學院提出了卡氏的名字。那份推薦函中充滿了讚美的詞句：「在義大利有很多人，包括我自己，不能同意詩人的見解，可是無人妄敢懷疑一項從未被一絲絲虛榮或私慾侵蝕過的光榮之純潔

（註）嘉圖（Marcus Porcius Cato）共有兩個，老嘉圖（234-149 B. C.）和小嘉圖（95-46 B. C.），都是著名的羅馬政治家。

性。在半個世紀中他的歌深深地激奮了義大利的靈魂。他一直是位堅毅的鬥士，他光輝奪目的詩篇如同一把利劍可以造成許多深深的傷口：或許他的詩之烈火跨越了原定的目標，可是他那顆奔放的心中絕無絲毫的憎恨。」

一九〇二、一九〇三、一九〇四以及一九〇五年的獎金落到別的地方。可是時間對義大利是愈來愈有利了。在瑞典，堅決支持這位波洛格納老教授的人一年一年地增加。一九〇六年瑞典學院終於全票通過決定頒獎給他。這項決議既未令人感到驚訝，亦未被人喝采。人們將它看做一件理所當然的事。他們心滿意足地看到這頂桂冠的「及時來到」。瑞典學院發出了一封信，通知卡氏：他業已獲獎，「不惟由於他淵博的學養以及批評性的深刻研究，更因他偉大詩作所特有的創造力、清新風格以及抒情性。」卡氏接到這封信時他感到了難以言喻的喜悅。一九〇六年十一月十五日他回了一封信給瑞典學院。這封信是由他的秘書協助完成的。這位癱瘓的老人在裏面煞費苦心地雕琢着美麗的辭藻：

「諸君以著名的瑞典學院之名寄給我的信，它所使用之高貴語言（按：即瑞典文），它所包涵之對我的謬誇，以及頒獎給我卑微作品之寬惠，使我的心中充滿了最深切、最真摯的謝意與感動；而我現在就是要告訴諸君，我將接受此項頒給我的至高榮譽，並將保守此項秘密，直到指定的日子。」

「我確實是十分幸運的。在我有生之年我獲得了人所能企求的最高喜悅；然而此一喜悅却不幸地罩上了一層痛苦的陰影——我無法親自前往那個榮耀的國都，在那個難以忘懷的日子裏，從尊貴的國王陛下手中接受此項鉅獎的獎章。」

「敬愛的先生們，我目前的羸弱使我的軀體無法做任何的動作；我現在只剩下我的頭腦和我的心了。以前者，我將向著名的斯德哥爾摩學院表達我對諸君的美意最懇切的謝忱；以後者，我將最虔誠地祝福瑞典國以及她的國王壯盛昌隆。」

卡度齊於次年與世長辭。

一九〇七年

(英國) 盧得雅·吉卜齡

(Rudyard Kipling)

一九〇七年，諾貝爾委員會很早便已經開始在物色一位得獎人了。八月左右，各式各樣的傳言紛紛出籠。好幾位爲人們所熟稔的作家都被提到。一家巴黎的報紙——不妥協者 (L'Intransigeant)——就刊出了這樣的一篇文章：

「今年那一個人會獲得此項鉅獎呢？我們在瑞典的一家同業宣佈說他們已經知道了。起先他們認爲是馬克吐溫這位因爲訪問英國而重振聲威的美國幽默家。可是後來諾貝爾委員會似乎發現了另一位更合適的人選：大英帝國的偉大小說家及詩人，盧得雅·吉卜齡——一位一直以高度的抒情及愛國的熱忱歌頌著英國阿兵哥的作家。他的叢林故事 (Jungle Book) 極爲人們所喜愛——甚至在此地。」

這個消息的來源是一家瑞典與報紙上的一篇短評。

這篇不顯眼的文章居然吸引了法國新聞界的注意，這證明諾貝爾獎的聲譽業已完全確立了。現在，候選人的姓名已經具有充分的新聞價值；而關於他們的激烈爭論也已經足以激發人們的好奇心，使他們忘却溽暑的沉悶了。

一九〇七年的遴選工作已經不似以前那麼單純了。今年諾貝爾委員會不僅要找尋得獎人，同時還得考慮得獎人的國籍。那麼，這屆的獎會落到那個國家呢？

由於普里東和米斯特拉爾，法國已經得到了她應得的讚揚了。蒙森也替德國贏取了一頂桂冠。一九〇三年，班生在榮耀的巔峯上豎起了斯堪地那維亞的旌旗。斯拉夫人則因顯克維支而尊貴起來。艾契加里和

卡度齊也分別光耀了他們的祖國；西班牙與義大利。現在，歐洲的大國中只剩英國還沒有得過獎了。那裏的人們苦苦地等候著瑞典學院來賞識這個「不惟是沙士比亞的故鄉，同時也是個道道地地的鼎盛帝國」——大不列顛。不過，英國人的等待是十分十分漫長的。

亞勒弗烈·諾貝爾在他的遺言及遺囑中都交待說：「我深切盼望，這些獎金的頒發不以國家為考慮。」

這項條文以至於整個諾貝爾組織的宗旨是要在民族間實現進步與和平的美夢。懷着和諾貝爾相同夢想的人們天真地以為文化界瀰漫著高超的理想。他們絕想不到，這些安詳而和諧的呼聲在現實的世界中並未召起多少反應。諾貝爾的夢是個不可能的夢。因為當時每一個「政治氣象的預測員」都明確地指出一件事實：這個世界業已進入一個武裝和平的新紀元了。

二十世紀初葉的世局是歷史上最大的諷刺：國際友好的口號不絕於耳，理想性質的和平會議處處召開。可是那幾年中，政治界却是背道而馳。人們將全部精力投擲於加深民族間的仇恨。政治家們討論著要如

何消彌嚴重的經濟敵對以及國際市場上的熾烈競爭。他們的結論是：攫取更多的殖民地。於是，政策一個接著一個出現了。而都是以黃金為依歸。在這樣混亂的一個時代中，這個「過時的理想主義之標幟」——諾貝爾獎，為什麼反而成了每個國家追逐的對象呢？原因是：這項鉅獎的背後隱藏着一個陰險的政治功用：國家的聲威。所有的東西都已經敗壞到這種程度：第一次世界大戰確實是迫在眉睫了。

一九〇七年這個新的一年將會帶來新穎而出人意料的消息。崇高的瑞典學院十分厭惡當時歐洲的那種反理想主義傾向，可是由於種種的原因，它在遴選得獎人的時候却也無法不考慮國籍的問題。學院裏頭有少數院士抱著相反的看法，所以學院幾乎每年都要爭辯這個問題。而這些少數的院士中最活躍的是一個老主教。他是個十分滑頭的人物，精通議會的花招，所以在學院裏相當有影響力。他這樣地呼籲道：「不管已故的亞勒弗烈·諾貝爾的願望如何，諾貝爾獎這杯羹必須『按照外交遊戲的規則』在不同的國家間傳來傳去。好一個主教，大家偷偷藏在心中的念頭現在終於

被他大聲說出來了！

在上面所說的這種局勢中，英國人採取了怎樣的步驟呢？剛開始的時候他們沒有行動：一九〇一年英國沒有參加角逐。那年的獎被法國得去之後，他們才譴責學院沒有通知英國她有參加競選的權利。爲了要補救這次的過錯，倫敦的作家協會迅速地組成了一個諾貝爾委員會，負責挑選合適的人選。從那時起，英國人對該獎的興趣便一直相當濃厚，他們的行動比他任何國家都要積極。一九〇二年，斯德哥爾摩從他們那兒接到了六十件提名；一九〇三年，四十四件；一九〇五年，三十五件。他們所推薦的名字確實都是上上之選：彷彿諾貝爾獎對倫敦作協非常有挑逗力似的。頭一年，史賓塞列於名單之首，由四十八位崇拜者所支持，不過史賓塞於次年（一九〇三年）去世，所以一切的努力便轉向了史溫朋。在倫敦作協中，大部份的會員都擁護史溫朋；這些支持者當中包括了不少大名鼎鼎的人物，像J. M. 巴瑞，奧斯汀·達卜遜，托瑪斯·哈代，亞瑟·吳因·皮涅羅，亞瑟·柯南·道爾，以及喬治·梅芮迪斯（George Meredith

）等。梅芮迪斯自己也有不少崇拜者，所以他的名字也就和史氏一併被送往斯德哥爾摩，史氏和梅氏都變成了「多年生植物」——他們的名字每年都被提出，可是時間一年一年地過去，諾貝爾獎始終不肯渡過北海。

一九〇七年來到了，不列顛重鑼重鼓再度推出老邁的史溫朋。這次他的支持者增加到二十七人。這個英國的「大合唱」復因一位瑞典人的加入，而顯得更加的聲勢凌人。那位瑞典人就是外交家畢爾特男爵（Baron Bidt）——一九〇六年的卡度齊便是在他的鼎助下獲獎的。可是，事情發生了出人意料的變化。

一九〇七年秋暮，吉卜齡的名字開始在報紙上出現。這個新名字立刻吸引了人們的注意。於是史溫朋獲獎的希望破滅了。

由於長期的失望，所以史溫朋如果再慘遭一次滑鐵盧英國人已經不會像以前那麼痛心了。甚至連倫敦作協都已經有了若干的心理準備。每日新聞（Daily News）的記者曾就此事向艾德蒙·高斯（作家協會諾貝爾委員會的秘書）做了一次專題採訪。高斯在措辭方面十分謹慎，他似乎在暗示著：今年的諾貝爾獎

將會頒給一位不是由作家協會推薦的人。高斯旋即說明道：年高德劭的卡度齊於得獎後第六個禮拜便告去世；大家都認為這個事實已經使瑞典學院相信，諾貝爾獎應該頒給一個前途大有可為的年輕作家。這點對七十歲的史溫朋大為不利。如果史氏沒有獲獎的話，那麼問題絕不是出在他的文學地位，而是出在他的年齡。

高斯所暗指的得獎人自然是吉卜齡。吉氏不能算是一名正式的候選人：因為推薦他的人們在正統文學界的眼中都是一些門外漢。吉氏如果得獎，大多數的英國人一定會大喫一驚的。他早年以「山中的小故事」(Plain Tales from the Hills)一書在英國文壇聲名鵲起，可是從那以後，他的評價就已經一天低似一天了。吉卜齡和迭更斯以及狄福有幾分相似，他們都是在本國受忽視而在外國却備受喜愛的英國作家。這位「傳奇性的英國人」在外國的崇高地位和他在本國的默默無聞形成了一個驚人的對比。他的作品剛一被介紹到法國就立刻大受歡迎，在瑞典亦然。他在其他的歐洲國家裏也都擁有廣大的讀者。他對瑞典文學發生了長遠的影響。在那個盛行著自我剖析的時代

中，北方國家的文壇上呈現出一片貧血的蒼白。在那兒，講述故事的人才十分凋零。吉卜齡的聲音對於拉格洛夫（她確實從這位英國大師那裏學習了不少東西）這類的作家來說，不啻是一帖提神的振奮劑。他的作品充滿着豐富的想像力，異國的情調、栩栩如生的人物。那些以印度為背景的故事經他娓娓道來，趣味盎然。吉卜齡是一個原始的天才，一個出色的民謠及童話故事作者。

由於以上的原因，瑞典學院終於把一九〇七年的獎金頒給了吉卜齡。

當吉卜齡抵達斯德哥爾摩的時候，所有的瑞典人無不感到極端的驚訝。這是一位蓄著一撮黑鬚的瘦小英國人，戴著一副鋼框眼鏡，鏡片後露出友善的眼光。

在人們的想像中，吉卜齡應該是像毛格利（Mowgli）一樣，帶著巴魯（Baloo）及巴及拉（Bagheera），在那些學院的 sahibs（印語：歐洲人、貴人）伴同下，像狼一般大搖大擺地大步跨了進來。或者像基姆（Kim），帶著他的喇嘛，一看到諾

貝爾獎就把箭河 (Arrow River) 給忘得一乾二淨。或者像英國阿兵哥 (Tommy Atkins) 一樣，穿著卡基布的衣服，在那個莊嚴肅穆的典禮中，像牛般地吼唱著軍隊的小曲或兵營的歌謠 (註)。

「當人們發現吉卜齡是和其他人一樣的人，發現他穿著黑西裝，打著白領帶，立刻引起了一陣陣的窃窃私語。」一位瑞典的新聞記者如此報導。「啊，多希望他手裏抓著一條蛇！」這位著名的作者確實是一個溫文、隨和的傢伙，完全適合諾貝爾頒獎典禮的場合。

在典禮(十二月十日)的前幾天，瑞典國王奧斯卡二世駕崩了。瑞典舉國同哀，靜候國王的葬禮。吉卜齡在他的自傳性的札記「關於我的二三事」(Something of myself) 中，追憶著當時他所看到的斯德哥爾摩。一個夕陽斜暉洒落在那個城市的時分，他走進皇宮去謁見新王。王宮的庭院、守衛御林軍的夾克以及一尊古礮上都覆滿了雪。穿過重重迴廊，他終

(註) 以上的名字和形容均取材自吉氏的作品。

於來到「古斯塔夫五世 (Gustav V) 的御前。國王滿臉倦容，兩眼垂視，對這幾位得獎人問候了一兩句。宮庭裏外充塞著哀悼的淒清沉寂。這時，勳章相碰的叮噹聲顯得格外的清晰。

頒獎後舉行的傳統性宴會被取銷了。這次的獎是在科學學院的大廳裏頒發的。儀式相當簡單，與會的只有寥寥數人。而由於在國喪期間，所以典禮進行時沒有掌聲，也沒有喝采。

不過在那幾天中吉卜齡還是發現了他在瑞典是多麼受人敬愛。一家報紙特地用英文在第一版上刊登了一篇讚美他的文章。一份教師的刊物發表了一則短文，介紹這位貴賓，並感謝他(不管是用直接或間接的方式)給予瑞典兒童的一切。斯德哥爾摩附近各小學的兒童們組成了一個代表隊到他投宿的大酒店，向他致敬。一個小女孩用英文發表了一篇十分好的演講(那是她好不容易背下來的)。然後他們爲他合唱了「甜蜜的家」(Home, Sweet Home) 以及瑞典的國歌。這個場合使所有的目睹者——當然也包括這位英國的貴賓——深爲感動。

還有一個小插曲。一位小朋友向他要一本英文本

的「叢林故事」。他答應了，並且履行了他的承諾。當他回到英國時，他就立刻寄出了那本書；他親筆在上面題著：「向小朋友做的許諾必須兌現。」

在斯德哥爾摩停留了幾天之外，吉卜齡就像他悄悄的來一樣，悄悄地離去。這一次他的目的地是南非——他將與家人在那兒度假。他的行囊中裝滿了這個

一九〇八年

(德國) 魯道夫·倭鏗

(Rudolf Eucken)

魯道夫·倭鏗由於一九〇八年「瑞典學院的晴雨計指示著哲學」而得到了該年的諾貝爾文學獎，而蒙森得獎的那年（一九〇二年）指示的則是歷史。這兩位偉人都不文學界的人物。他們所以能夠獲獎乃是因為瑞典學院對文學一詞有其特殊的解釋（從詩到人文學科）。後來學院更依照這個尺度把獎金頒給了亨利·柏格森（一九二七年），以及溫士頓·邱吉爾（一九五三年）。

北方王國贈送給他的紀念品，而其中最有意義的就是那紙諾貝爾獎狀。它讚揚著：

「使這位舉世聞名的作家的創作別具一格之觀察力、創造性、想像力、雄勁的觀念以及敘述之獨到才華。」

一九〇八年諾貝爾委員會在討論的時候並未涉及瑣細的問題，因為有三個基本的問題亟待解答。第一，倭鏗是何許人呢？而這一問題剛一獲得解答，第二個第三個問題就緊接著來了。如果這位耶拿大學的哲學教授想要得到諾貝爾文學獎的話，那麼他是否符合了「思域開闊」這個必備的條件呢？如果本年度的獎金非要頒給哲學界（尤其是德國的哲學界）不可的

話，那麼何不選擇海因利希·黎喀特 (Heinrich Rickert)、赫爾曼·柯亨 (Hermann Cohen) 或者維恆·溫德邦 (Wilhelm Windelband) 呢？倭鐸在他的自傳 (一九二一年出版) 中坦供：他對這些問題既感到尷尬又覺得惱怒。可是大體上說來他是滿意的，因為外國人終於賞識了他的卓越思想。

倭鐸對瑞典的影響力很顯然是得力於「觀念」、「觀念論」以及「觀念論者」這些字眼。(註)而學院也正是用這些高貴的字眼來讚揚他的。

在法國，「觀念」這個概念遠在笛卡兒的時代就已經受到重視了。其中由於威克多·古善 (Victor Cousin) 的鼓吹而逐漸抬頭。最後終於在亞勒弗烈·浮伊累 (Alfred Fouillée) 的影響下蔚成了一股風尚。可是「觀念論」這個字一直很少被法國人使用

(註) 諾貝爾獎的宗旨是在獎掖俱有「理想主義」傾向的人。理想主義與觀念論在英文中俱為 idealism，義稍不同，不過却有極深的血緣關係。

，因為奧古斯特·孔德 (Auguste Comte) 以及波濤洶湧的實證論為精神主義名詞之誤用「打了一箇有效的預防針」。所以當法蘭西斯學院於一八七八年將「觀念論」、「觀念論者」這兩個字搜進它所編的字典時，事情顯得相當突然。許多法國人認為，這是對萊茵河沿岸思想狂瀾的一項讓步：在那兒，ideal-ismus 一字被廣泛地使用著，被細心地栽培著，「普遍得像天竺葵，充斥於每位教授及布爾喬亞（中產階級）的陽台上」。這是一個泛濫得已經失去任何意義的字眼。

這個浪漫哲學的復興對瑞典文化發生了難以估量影響。費希德 (Fichte)、謝林 (Schelling) 以及那個時期的黑格爾使瑞典的大學和知識圈都籠上了唯心哲學的色彩。甚至連瑞典國內一些德高望重的思想家也在宣揚著一種正統而保守的觀念論。他們將眼光從瞬息萬變的表象世界移開，轉投到永恆的心靈樂土，在那兒找尋了一線神聖的亮來指引人類。觀念論在瑞典的勢力龐大得無以復加，因此，繼起的一代（實證論的信徒）以及史特林堡 (August-

Strindberg) 在瑞典知識界的奮鬥是極為艱苦的。

瑞典學院非常尊重這個遭受史特林堡猛烈攻擊的「專業的觀念論」；這乃是由於學院肩負著一項特殊的使命：遵照亞勒弗烈·諾貝爾的遺囑，在世界文學中遴選一位帶有「理想主義傾向」的得獎人。在那些高貴的院士眼中，這個標準是既自然又恰當的。就這個標準來看，德國的哲學家倭鏗就像「瑞典學院訂製的一樣合適」。諾貝爾委員會終於抓到了一個不容爭議的觀念論者！這位耶拿的使徒傳揚著一種多少帶著神聖氣息的真理，他不但是個卓越的教師，同時也是個極有天份的作家。

他是由一位瑞典的同僚又是他在古騰堡大學（University of Gothenburg）的鼓吹者所推薦的。支持者似乎不在少數。那年年底消息公佈了：魯道夫·倭鏗將親自前往領獎。

倭鏗是個哲學家，處處表露出實事求是的精神。當他抵達斯德哥爾摩的時候，他心平氣和地對一位向他挑釁的記者宣佈道：他曾秉諸良心地研究過一切有關諾貝爾獎的規定，自認符合一切必備的條件。他接著補充說，他的作品在全世界已經愈來愈風行了：「我現在很熱門。」

頒獎典禮的時候，他沒有發表正式的答謝演講。由於他的見解是如此的脫離現實，所以誰也不知道他是否體認得出這筆獎金的好處。可是如果那是個幣制穩定的幸福時代，那麼我們大可合情合理地猜想：他是不會討厭現鈔的。不過從永恆價值的角度看去，那紙諾貝爾的獎狀更有意義，獎狀上說他之獲獎乃是由於：

「他對真理的熱切追求，他對思想的貫通能力、他廣闊的觀察，以及他在無數作品中辯解並闡釋一種理想主義的人生哲學時所流露之熱誠與力量。」

• 待續